

# 冷战后国际民主化视角下的 中东欧政治转型

——基于若干国际民主测评指标的批判性分析\*

赵卫涛

**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前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范畴内的东欧剧变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东欧国家政治转型呈现叠加状态,为冷战后的中东欧政治转型提供了另一重观察与研究的视角。然而,自冷战结束后,以西式自由民主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及其研究范式却始终牢牢占据国际民主化与中东欧政治转型研究领域的主导地位,甚至形成某种意义上的话语霸权,而由少数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民主测评指标体系在其中无疑扮演着极为重要的工具性角色。本文从冷战后国际民主化背景下的中东欧政治转型研究出发,结合对当前国际上有关民主测量与评估的若干主要指标体系的批判性分析,尝试在廓清西方民主测评指标体系“科学”“中立”迷思的同时,对30年来中东欧地区的民主化进程及其最新发展状况进行相应的再审视与再反思。

**关键词:**中东欧 民主化 政治转型 民主测量 非自由民主

## 一 引言

1974年4月25日,一场由葡萄牙中下级军官发动的军事政变推翻了当时的军事独裁政权。这场被称为“康乃馨革命”的政治事件的影响在随后十几年内迅速波及南欧、拉美、东南亚和东亚等广大地区,引发了一系列“民主转型”(democratic transition)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从发生的时间和地区的先后顺序来看,自1974年起,这场被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称为民主化的“第三波”的政治浪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国际民粹浪潮下的民主反思研究”(批准号:19CGJ033)的阶段性成果。感谢《欧洲研究》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建议,文中错漏之处由作者负责。

潮率先开始于南欧地区的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并很快波及拉丁美洲的多米尼加、秘鲁、厄瓜多尔、阿根廷和巴西等国。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历史似乎要将“东欧”作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临界点。亨廷顿对不同时期 100 万人口以上国家民主状况的相关统计显示,即使是在前两波民主化浪潮的“波峰”阶段,也就是 1922 年和 1962 年,全世界所谓“民主”国家占有国家数量的比例也均未过半(分别为 45.3% 和 32.4%)。直到东欧剧变爆发前后的 1990 年,“第三波民主化还是没能把民主国家占世界国家总数的比例,提高到 68 年前(1922 年)的那个波峰的水平之上”。<sup>①</sup> 自 1989 年波兰剧变起,民主化浪潮开始迅速席卷苏联东欧这一传统的社会主义阵营地区,民主德国、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以及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先后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工人党)的领导,它们或停止存在,或改旗易帜,或分裂重组。在短短三年时间内,该地区的国家数量便由剧变前的 9 个迅速增加到剧变后的近 30 个,从而极大地改变了所谓“民主”与“非民主”国家的数量对比状况。正因为如此,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才从冷战后国际民主化的视角出发,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视为“第三波”后期全球民主运动最大的“增长点”。<sup>②</sup>

2019 年是东欧剧变 30 周年,国内外学术界对这场政治变迁的性质、过程、原因、教训等的探讨、争论仍在进行之中。<sup>③</sup> 过去 30 年来,除了“经济转轨”,针对中东欧政治转型或民主化的相关研究也一直是国内外学界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并产生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回顾历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视角下的东欧剧变与“第三波”浪潮中的中东欧国家民主化的集体转型呈现出一种“叠加”形态,无疑为 20 世纪 90 年代的地缘政治变革增添了更多值得从另一重学术角度加以深入探究的价值与意义。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以西式自由民主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及其研究范式始终牢牢占据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民主化与中东欧政治转型研究领域的主导地位,甚至已经

<sup>①</sup> [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 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欧阳景根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0 页。

<sup>②</sup> [美]拉里·戴蒙德:《民主的精神》,张大军译,群言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2 页。

<sup>③</sup> 国内学界目前关于东欧剧变 30 年的主要研究成果,可参见孔寒冰:《对当前中东欧研究的几点学术辨析》,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9 年第 1 期,第 50-60 页;郑智超:《东欧的苏联模式化与苏联模式化的东欧——东欧剧变根源的历史再考察》,载《社会科学动态》,2019 年第 1 期,第 13-20 页;姬文刚:《东欧剧变 30 年来波兰的外交与安全转型》,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2 期,第 112-120 页;高歌:《东欧剧变与冷战结束》,载《俄罗斯学刊》,2019 年第 3 期,第 5-27 页;李瑞琴:《东欧剧变 30 年:重塑与蹉跎》,载《当代世界》,2019 年第 4 期,第 29-34 页;朱晓中:《转型三问——写在中东欧转型 30 年之际》,载《当代世界》,2019 年第 4 期,第 24-28 页;单超:《“东欧剧变前后的保加利亚”座谈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 年第 6 期,第 27 页;孔田平:《中东欧经济转轨 30 年:制度变迁与转轨实绩》,载《欧亚经济》,2019 年第 3 期,第 1-27 页。

形成某种意义上的话语霸权。在这一既有框架的影响下,论证和维护西式自由民主的正当性、合理性、终极性被视为民主化与中东欧政治转型研究的“正统”“主流”,质疑或否定西式自由民主则往往被冠以“非自由民主”“威权”甚至“专制”等意识形态化的标签。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以美国自由之家“全球自由评估”(Freedom in the World)、英国经济学人情报社“民主指数”(Democracy Index)等为代表的非政府组织及其民主测评指标、排名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不断增强。这些名目繁多的指标体系名义上标榜“科学”“中立”,实则仍是以宣传并维护西式自由民主为核心要旨,其中更不乏少数西方大国借助民主话语霸权指责、影响他国民主人权状况等政治意图。笔者认为,从剧变前后的激进变革,到新世纪前后的所谓民主“回潮”或“倒退”,再到2010年以来的所谓“非自由民主”,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仍在不同程度地出现并作用于中东欧政治转型与民主化进程之中。鉴于此,本文尝试从冷战后国际民主化背景下的中东欧政治转型研究出发,结合对当前国际上有关民主测量与评估的若干主要指标体系的批判性分析,尝试在廓清西方民主测评指标体系“科学”“中立”迷思的同时,对30年来中东欧地区的民主化进程及其最新发展状况进行相应的再审视与再反思。

## 二 冷战后的中东欧政治转型研究:文献简评

社会科学相关概念与理论的创新往往是与现实社会中的具体实践相伴而生、相互影响。其中,政治转型理论与20世纪后期兴起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间就存在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20世纪70—80年代,南欧、拉美地区的民主化运动正步入“全盛”时期。与轰轰烈烈的民主化运动相对应的是,“民主转型”(democratic transition)也开始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sup>①</sup>20世纪70年代末,以历史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著称的美国威尔逊中心(Wilson Center)开始有组织地集中力量对当时南欧、拉美不断发展的民主化运动进行系统研究。到1986年,相关研究成果汇集成一部四卷本丛书——《从威权主义转型:民主的前景》(*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Prospects for Democracy*)。其中,在第四卷《威权统治的转型:关于不确定民主的试探性结论》(*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中,相关学者就政治转型进行了深入研究,并由此奠定了民主转型的一些基本研究范式与理论

<sup>①</sup> Samuel P. Huntington, "Will More Countries Become Democratic?"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99, No. 2, 1984, pp. 193-218.

框架。<sup>①</sup> 在这部关于民主化的早期研究著作中,政治(民主)转型被认为是从一种旧制度向另一种新的制度的“过渡”,它的起点是所谓“威权政体”(Authoritarian regime),终点则是以西欧、北美等传统西方国家政治制度为参照的多党代议制民主。

就政治转型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而言,1989年东欧剧变的爆发无疑为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西方民主化研究拓展了新的学术空间。相应地,一大批民主化领域的知名学者纷纷将研究的眼光和注意力转向中东欧地区。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亨廷顿、胡安·林茨(Juan J. Linz)和阿尔弗雷德·斯泰潘(Alfred C. Stepan)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各自在政治转型或民主化的基本概念、演变过程、模式与前景等多个研究侧面开展了一系列深入研究。<sup>②</sup> 此后,国外学界的相关具体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转型模式的研究,具体涉及转型方式、转型前后的政体类型及其划分标准、转型过程中精英集团与民众及其各自内部间的互动关系等;<sup>③</sup>二是转型动因,重点从内外因相结合的角度展开相关研究;<sup>④</sup>三是随着中东欧地区大规模民主转型的结束以及民粹主义泛滥、“非自由民主”(illiberalism)大量出现等民主“回潮”现象的蔓延,中东欧民主转型研究开始逐渐让位于针对民主转型基本完

<sup>①</sup> 赵卫涛:《国外中东欧政治转型研究:范式、过程与反思》,载《国外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第42-51页。

<sup>②</sup> 参见[美]亚当·普沃斯基:《民主与市场——东欧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改革》,包雅钧、刘忠瑞、胡元梓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美]胡安·林茨、阿尔弗雷德·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sup>③</sup> 参见Gerardo L. Munck and Carol Skalnik Leff, "Modes of Transi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outh America and Eastern Europ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29, No. 3,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A Special Issue in Memory of Dankwart A. Rustow, 1997, pp. 343-362; [美]亚当·普沃斯基:《民主与市场——东欧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美]胡安·林茨、[美]阿尔弗雷德·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 [美]特里·林恩·卡尔、[美]菲利普·C·施密特:《拉丁美洲、南欧和东欧的过渡方式》,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2年第2期,第27-43页。

<sup>④</sup> 参见[美]吉列尔莫·奥唐奈、[意]菲利普·施密特:《威权统治的转型:关于不确定民主的试探性结论》,第24页; [美]胡安·林茨、[美]阿尔弗雷德·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第71-88页; [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第42页; Michael Bernhard, "Civil Society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East Central Europ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08, No. 2, 1993, pp. 307-326; Beverly Crawford and Arend Lijphart, "Explaining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nge in Post-Communist Eastern Europe: Old Legacies, New Institutions, Hegemonic Norms, and International Pressur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28, No. 2, 1995, pp. 171-199; Antoaneta Dimitrova, "International Actors and Democracy Promotio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the Integration Model and Its Limits," *Democratization*, Vol. 11, No. 5, 2004, pp. 91-112; Geoffrey Pridham, "Revisiting 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of Regime Change: Ten Years After In East-Central Europe," *Society and Econom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Vol. 22, No. 1, 2000, pp. 7-59。

成后的民主巩固(democratic consolidation)问题的研究。<sup>①</sup>

与国外同时期、同阶段相比,国内学界关于冷战后中东欧政治转型(轨)<sup>②</sup>的研究在目的、立场、观点、方法和具体案例都存在一系列重要区别。例如,从研究的基本目的和动机来看,国外相关研究着重于从民主化视角展开,重在考察中东欧民主转型的动因、模式及其后续发展如民主巩固等。而国内学界相关研究则将中东欧政治转型视为东欧剧变及其后续延伸,重在考察中东欧走向民主转型的深层次原因以及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变色”的具体历程与相关教训。同时,依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可将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区分为相应的不同类别。例如,从研究者的学科属性角度出发,大体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类别:一是基于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学科视角,将中东欧视为社会主义东欧的衍生概念,重点考察与探讨中东欧国家共产党或工人党丧失政权的原因与经验教训;二是从区域或国别研究的综合性学科视角出发,回顾与总结中东欧地区政治转型(轨)的历史背景、现实动因、具体过程及其结果与影响;三是基于政治学如比较政治的学科视角,从政治转型、民主化等一般性理论入手,分析中东欧政治转型的具体动因、过程与结果。

结合国内学界相关研究的发展历程与现状,本文认为,可从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层次对中东欧政治转型(轨)的研究及其成果大致加以划分。其中,宏观层面主要指将中东欧政治转型(轨)纳入原苏联东欧国家范围或从一般意义的转型(轨)的综合性视角出发的研究路径及其相关成果;中观层面主要指以中东欧或其中的某一次区域为对象的研究路径及其相关成果;微观层面主要指以中东欧地区内某一国或某几个具体国家为案例的研究路径及其相关成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研究对象本身的复杂

---

<sup>①</sup> See Samuel P. Huntington, "Democracy For The Long Haul,"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7, No.2, 1996, pp. 3-13; Larry Diamond, "Thinking about Hybrid Regime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3, No.2, 2002, pp.21-35; Juan J. Linz and Alfred Stepan, "Toward Consolidated Democracie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7, No.2, 1996, pp.14-33; Nina Bandelj and Bogdan Radu, "Consolidation of Democracy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CSD Working Paper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2006-07-28; Geoffrey Pridham, "European Union Accession Dynamic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Past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 41, No. 3, 2006, pp. 373-400; Bojan Bugarcic, "Populism, Liberal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41, No.2, 2008, pp.191-203; Tanja A Börzel, "Why You Don't Always Get What You Want: EU Enlargement and Civil Societ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cta Politica*, Vol.45, Issue 1-2, 2010, pp. 1-10; Marc F. Plattner and Larry Jay Diamond, "Is East-Central Europe Backsliding?"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8, No.4, 2007, pp.5-6.

<sup>②</sup> 如前文所述,相比于国外学界较为统一地使用“transition”一词,国内学界针对冷战结束以来发生在中东欧地区的这场政治变迁的具体称谓却存在一定的分歧。对于国内学界而言,“转轨”和“转型”最为常用,相应的还有“改革”“改良”等。需要指出的是,鉴于上述称谓指代的实际上是基本一致的对象,并无实质性区别。因此,从研究的便利性和前后一致性角度出发,下文中不再对相关称谓做进一步详细区分,而是统一使用“转型”一词(引用其他既有研究成果的情况除外)。



性与学术研究的多样性等因素的影响,要对中东欧政治转型(轨)的研究及其成果进行完全泾渭分明的精准划分与评价实际上并不现实。<sup>①</sup>

总体而言,自冷战结束后,国内学界针对中东欧政治转型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长足进步。在与中东欧政治转型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尤其是个别重大课题上,国内学界也形成了基本一致且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共识与重要结论。在一些涉及政治转型的基本判断和重大命题上,国内学界也都形成了较为全面客观的观点、结论及其相应成果。例如,在东欧国家剧变的动因问题上,国内学者从“内因为主,外因同样重要且不可或缺”的基本立场出发,得出了一系列令人信服且经得起历史验证的研究成果。相比而言,国外学界的相关研究则大多未能从根本上摆脱“西式民主一元论”思维框架的束缚,将东欧剧变解读为共产主义的终结和西式自由民主的必然胜利,因而并不能较为客观公正地论述个中根源;对于很多中东欧本土学者而言,他们往往根据自身感受,格外强调放宽出国旅行政策以及东西方生活水平差距所产生的重要影响。甚至有中东欧学者认为,中东欧不是剧变而是转型,这一转型的过程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已经开始。<sup>②</sup>关于政治转型,国内学界普遍认为,尽管中东欧国家均实行了以民主化为目标的政治转型,但仍然需要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民主制度。在判别标准上,国内多数学者认为,应将完成转型基本任务与完成转型相区分,并重视从实践层面考察,将是否充分考量本国国情、人民利益,在应对挑战中是否做出了有效调整等作为转型是否完成的标准。<sup>③</sup>

综上,本文认为,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国内外中东欧政治转型研究在角度、主题和方法等方面仍有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的空间。一方面,国外学界相关研究虽不乏丰富性与多样性,但整体上受制于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和“西式民主一元论”等意识形态偏见,无法跳出“民主—专制”“西方—非西方”的二元对立框架。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后转型”时代中东欧地区不断出现的“民主回潮”、民粹主义盛行等现象,传统的以西式自由民主为中心的转型学(transitology)、民主巩固等研究范式并不能给予全面、深刻的回答;<sup>④</sup>另一方面,国内学界针对中东欧政治转型的研究虽

<sup>①</sup> 鉴于篇幅以及与本文研究主题的相关度和重要性等问题,在此对国内学界有关中东欧(东欧)政治转型的相关主要研究成果不再逐一详细列出。

<sup>②</sup> 黄立服、杨喆:《中东欧转型研究中待深入探讨的六个问题》,载《俄罗斯学刊》,2013年第5期,第135-136页。

<sup>③</sup> 同上,第138页。

<sup>④</sup> Thomas Carothers, “The End of the Transition Paradig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3, No.1, 2002, pp.5-21; Marc F. Plattner and Larry Jay Diamond, “Is East-Central Europe Backsliding?”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8, No. 4, 2007, pp.5-6.

取得了一系列长足进步,但在以下两个方面有待改进与突破:一是在研究主题上,冷战结束后至今30年间,随着国际国内主客观环境的不断变化,国内在中东欧政治转型研究领域出现主题转换和跟进不足的滞后状态;二是在研究方法上,国内学界在中东欧政治转型研究领域仍以平铺直叙式的“传统的”“综合式”研究方法为主,表现出程度不一的方法固化而创新不足的倾向。下文将以冷战后30年中东欧政治转型及其最新发展为现实范本,并基于对若干国际民主测评指标的批判性分析,尝试廓清长期以来围绕民主化及其测评指标体系的一些理论迷思与现实问题。

### 三 冷战后30年中东欧政治转型评估: 基于若干国际民主测评指标的批判性分析

冷战结束以来,伴随着民主化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国际上针对民主、自由的评估与量化方面的研究与实践也不断走向深入。为数众多的学者、国际组织、各种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纷纷加入对民主、自由的评估与测量活动中来。本文认为,从民主化的视角观察和研究冷战后的中东欧政治转型,选择以民主的测量和评估指标体系切入,通过将中东欧转型进程与当前国际上有代表性的评估指标体系相结合,辅以对冷战后世界范围内民主化的经验教训与国际民主、自由评估的反思,是从另一个角度对冷战后的中东欧政治转型进行研究的有益尝试。以下本文将通过对“民主指数”(Democracy Index)等国际影响力较大的测量评估指标及其关于中东欧国家的具体考察,对冷战后的中东欧政治转型予以相应的分析与论述。

#### (一) 民主测量及其指标体系

从严格意义上讲,国际上关于民主测量的研究与实践始于二战结束后。20世纪50-60年代,以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协会比较政治委员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s Committee on Comparative Politics)成员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最早对政治发展及其测量问题展开研究。几乎在同时,欧美国家的一些政府或非政府组织也开始在学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依据特定的标准或维度对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民主状况进行测量与评估。20世纪70年代,随着西式自由民主理论研究的深入开展,其民主测量在研究成果方面不断走向多样化的同时,却在研究方法和范式上变得日趋保守。其中,罗伯特·达尔(Robert A. Dahl)关于多头政体(polyarchy)的“竞争—参与”研究范式对

民主测量的影响举足轻重。<sup>①</sup>沿着达尔的分析路径,西方学者继续从概念、方法和指标等多方面将民主测量推向深入。同时,一大批由学者创立的指标体系也不断出现。总体而言,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有关民主测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民主研究领域的相关学者与科研机构。他们从概念、标准、方法与指标体系构建等方面确立了西方民主测量的基本要件,从而为70年代后西方更大范围、更多主体层面的民主测量研究与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sup>②</sup>

冷战结束后至今,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关于民主测量与评估的指标体系已颇具规模。以开展测量与评估的主体为划分标准,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以学者或学术研究机构为主体的测量及其指标体系;二是以政府间国际组织为主体的测量及其指标体系;三是以非政府组织(NGO)为主体的测量及其指标体系。从时间上看,国际上关于民主的测量与评估体系的发展、成熟与几乎同时兴起的“第三波”民主化运动之间呈现出较高的同步性。1972年,总部位于美国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首次发布了针对全球范围内国家和地区的民主、自由评估报告——“全球自由评估”(Freedom in the World)。自1978年起,“全球自由评估”报告改为年度性发布并一直持续至今。

虽然从研究主体的定位和层次上看,来自非政府组织的测量及其指标体系无论从学术性还是主体的级别层面上似乎都与前述两类存在一定的差距。但就国际影响力而言,非政府组织的测量、指标体系和排名在国际范围内无疑具有更大的话语权。长期以来,由它们所进行的民主测量及其最终报告在国际社会始终保持极高的曝光度和强大的话语权威。大体而言,当前国际上来自非政府组织的较有影响力的评估指标体系主要包括:美国“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全球自由评估(Freedom in the World)以及转型国家评估(Nations in Transit)、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情报社(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民主指数(Democracy Index)<sup>③</sup>、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Bertelsmann)的贝塔斯曼转型指数(Transformation Index)<sup>④</sup>、民主与选举援助研究所(IDEA)的民主评估(Democracy Assessment)<sup>⑤</sup>以及奥地利民主排名协会(Democracy Ranking Association)的全球民主质量排行(Democracy Ranking of the Quality of Democracy)<sup>⑥</sup>,等等。

<sup>①</sup> [美]罗伯特·达尔:《多头政体——参与和反对》,刘惠荣、谭君久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4-18页。

<sup>②</sup> 赵卫涛、张树华:《西方民主测量的理论局限与政治反思》,载《政治学研究》,2016年第4期,第45-56页。

<sup>③</sup> [http://www.economist.com/media/pdf/DEMOCRACY\\_INDEX\\_2007\\_v3.pdf](http://www.economist.com/media/pdf/DEMOCRACY_INDEX_2007_v3.pdf), last accessed on 15 August 2019.

<sup>④</sup> <http://www.bti-project.org/index/>, last accessed on 15 August 2019.

<sup>⑤</sup> <http://www.idea.int/publications/>, last accessed on 15 August 2019.

<sup>⑥</sup> <http://democracyranking.org/wordpress/>, last accessed on 15 August 2019.



应当看到,二战结束后,在行为主义、后行为主义革命等的直接影响和促进下,西方民主测量与评估在系统化、量化和模型化等方面取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一代代学者和机构不断参与其中,相应的种类多样的测评指标体系也不断涌现。可以说,上述民主测评领域的“繁荣”无疑给战后的西方民主测量增添了所谓“科学”“中立”的色彩。然而,从民主的定义、数据来源与评分等多方面来看,西方民主测量不仅无法确保测量的科学性,更难言所谓“中立”。首先,西方民主测评指标体系所定义与测量的民主并非具有普遍共识的民主,而仅仅是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评判标准的西式自由民主。这一民主概念始自20世纪40年代熊彼特对古典民主概念的“精英化”改造。<sup>①</sup>在这一过程中,民主概念从“人民的权力”被偷换为“人民投票选择精英的权利”,从而在根本上背离了民主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实质;其次,数据来源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也使得相对应的测量无法确保真正的客观与公正。例如,在数据来源方面,民主指数除了自主设计的调查问卷之外,还吸收了大量来自第三方的调查数据,如盖洛普民意测验、民主晴雨表调查等。这些调查与相应数据在主客观比重、准确性、时效性等多方面本身会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甚至自相矛盾之处,而其对数据的处理方法却几乎是西方民主测评中的通用做法;再次,以民主指数为代表的西方民主测评指标的评估与赋分过程也存在极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例如,为了便于回答和加总分值,“民主指数”的相关问题往往被简化为“是”“否”和“中”等两个或三个选项。相应地,选项所赋分值多为0分或1分,个别存在“中”选项的部分会增加0.5这一分值。可以说,用这种极端简化、非黑即白的处理方式考察一国或地区的民主状况,其最终结果的可靠性本身就存在极大的争议。此外,不同选项的得分究竟是依据自主调查数据还是第三方数据、抑或二者兼有?哪些问题的评分来自所谓“专家评估”?哪些来自民意调查?二者之间的比重又是如何划分的?对于这些问题,民主指数及其评估报告均未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相比具体的指标设定与测量等技术层面因素,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与背后不容忽视的政治外交意图则是西方民主测量及其指标体系存在本质性缺陷的根源。实际上,西方民主测量及其指标体系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对抗色彩。以“自由之家”及其全球自由评估为例,这家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促进有关民主、自由的研究与推广的机构虽对外标榜“中立”的非政府属性,但其预算中多达80%来自美国政府。此外,“自由之家”的核心产品——全球自由度评估报告也产生自冷战高峰

<sup>①</sup> [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建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95-396页。

时期的 20 世纪 70 年代,并从一开始就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外宣扬西式自由民主、分化瓦解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执政党的重要工具。冷战结束以来,国际上围绕意识形态的斗争也并未随着冷战的终结而消失。相反,少数西方大国凭借对“民主、人权、自由”等话语的垄断,不时挥舞“民主”大棒,对不符合西方民主评价标准的后转型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民主、人权状况以及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等横加指责,甚至将这种“话语霸权”作为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民主输出”“颜色革命”等民主“渗透”战略的工具。其中,由少数西方大国主导的民主测评指标体系无疑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 (二) 中东欧民主转型评估:基于民主指数年度报告(2006-2018 年)的分析

### (1) 民主指数(Democracy Index)

民主指数是由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社旗下的信息情报社创立的一套全球民主评估指标体系,其测评范围涵盖全世界 167 个国家和地区。该指数于 2007 年首次发布,2009 年第二次发布,并从 2011 年起改为年度性发布,具体测评时段为过去一年。因此,截至目前,它已经累计发布了 11 份年度报告。为了从名称上与国际上其他民主测评相区别,该指数通常也被称为“经济学人情报社民主指数”(EIU Democracy Index)。相比自由之家的全球自由评估报告,民主指数虽然起步较晚,但依托《经济学人》杂志这一媒体平台所具有的全球影响力,在不到 20 年的时间内就已具备相当程度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在具体的指标体系方面,经济学人情报社民主指数将对民主的测评指标扩展为五个大类:选举过程与多元化(electoral process and pluralism)、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政府运行(the functioning of government)、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和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这五个方面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一个整体。从测评方式与评分方法等方面来看,民主指数与全球自由评估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在上述五个大类之下,民主指数评估分别设置了若干子问题,其分布状况分别为:“选举过程与多元化”设有 12 个子问题;“政府运行”设有 14 个;“政治参与”设有 9 个;“政治文化”设有 8 个;“公民自由”设有 17 个。子问题以选择题的形式出现,选项为两个或三个,不同选项的评分由高到低分别为 1 分、0.5 分或 0 分、0.5 分、1 分。在对每一个大类的得分加总之后,再对五个大类得分进行简单平均后得出的位于 0-10 分之间的分数即为最终的民主指数评分,0 分最低,10 分最高。其中,8 分以上到 10 分之间为“完全民主”(full democracy),6 分以上到 8 分为“有瑕疵的民主”(flawed democracy),4 分以上到 6 分为

“混合政体”(hybrid regime),4分及以下为“威权政体”(authoritarian regime)。<sup>①</sup> 在具体的测评对象国方面,经济学人情报社民主指数并没有将“中东欧”单独列出,而是将其整体列入“东欧”(Eastern Europe)子类别。这里的“东欧”不仅包括本文所指的中东欧16国,还包括俄罗斯、乌克兰等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共计28个。因此,为了避免混淆和歧义,以下本文所引用的来自经济学人情报社民主指数的相关数据,其对象仅指剔除了其他12个国家之后的中东欧16国。

## (2) 中东欧16国民主指数(2006–2018年)分析

2019年1月,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旗下的情报社正式对外发布了2018年度的全球民主指数报告。这份题为《民主指数2018:我也一样吗?》(Democracy Index 2018: Me Too?)的民主测评报告延续了以往对全球民主化发展持有的一贯消极悲观的总基调,认为2018年全球民主化水平依然呈现“稳中缓降”的总态势。报告在前言中指出,2018年全球民主评分的均值与去年持平(5.48)。与2017年(49.3%)相比,生活在不同程度的“民主”下的人口比例下降到了47.7%。仅有约4.5%的全球人口生活在“完全民主”国家,多达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所谓威权或专制政体之中。<sup>②</sup> 为了便于更加直观、全面地了解冷战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东欧16国民主状况的发展变化及其总体趋势,本文围绕经济学人情报社最新民主指数报告,对该机构从2007年至今发布的共11份民主指数测评报告的相关排名、数据进行了梳理与总结(见表1)。

表2为根据2018年度经济学人情报社民主指数报告数据制作的欧洲与全球民主指数总体评分统计表。该表以国家类型(regime type)的数量和相应占比为主要指标,以西欧<sup>③</sup>和全球167个国家和地区为参照对象,对中东欧16国最新的民主发展状况予以对比呈现。如表2所示,首先,中东欧16国在2018年度的评估报告中属于“完全民主”国家的个数依然为0。相比而言,在全球共计20个“完全民主”国家中,西欧就有14个,占比高达70%;其次,中东欧16国中有12个被划分到了仅次于“完全民主”的“有瑕疵的民主”国家之列,占比达到75%,成为中东欧16国中占绝大多数的民主类型;再次,中东欧16国中没有国家被列入民主评分最低的“威权/专制政体”,这一点和西欧保持一致,也远低于全球的平均水平。

<sup>①</sup> [https://www.eiu.com/public/topical\\_report.aspx?campaignid=Democracy2018](https://www.eiu.com/public/topical_report.aspx?campaignid=Democracy2018), last accessed on 20 August 2019.

<sup>②</sup> [https://www.eiu.com/Handlers/WhitepaperHandler.ashx?fi=Democracy\\_Index\\_2018.pdf&mode=wp&campaignid=Democracy2018](https://www.eiu.com/Handlers/WhitepaperHandler.ashx?fi=Democracy_Index_2018.pdf&mode=wp&campaignid=Democracy2018), last accessed on 20 August 2019.

<sup>③</sup> 民主指数报告中的“西欧”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西欧,而是一个包含了地理上的西欧、北欧、南欧以及土耳其在内的一个相对混杂的概念,共计21个国家。

表 1 中东欧 16 国民主指数排名与评分统计表(2006-2018 年)

	2006 年		2008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捷克	18	8.17	19	8.19	16	8.19	16	8.19	17	8.19	21	8.06	25	7.94	25	7.94	31	7.82	34	7.62	34	7.69
斯洛文尼亚	27	7.96	30	7.96	32	7.69	30	7.76	28	7.88	30	7.88	37	7.57	36	7.57	37	7.51	36	7.5	36	7.5
爱沙尼亚	33	7.74	37	7.68	33	7.68	34	7.61	34	7.61	36	7.61	34	7.74	29	7.85	29	7.85	30	7.79	23	7.97
匈牙利	38	7.53	40	7.44	43	7.21	49	7.04	49	6.96	49	6.96	51	6.9	54	6.84	56	6.72	56	6.64	57	6.63
立陶宛	39	7.43	42	7.36	41	7.24	41	7.24	42	7.24	38	7.54	38	7.54	38	7.54	38	7.47	37	7.41	36	7.5
斯洛伐克	41	7.4	44	7.33	38	7.35	38	7.35	40	7.35	41	7.35	45	7.35	43	7.29	42	7.29	44	7.16	44	7.1
拉脱维亚	43	7.37	46	7.23	48	7.05	48	7.05	47	7.05	47	7.05	39	7.48	42	7.37	41	7.31	40	7.25	38	7.38
波兰	46	7.3	45	7.3	48	7.05	45	7.12	44	7.12	44	7.12	40	7.47	48	7.09	52	6.83	53	6.67	54	6.67
保加利亚	49	7.1	52	7.02	51	6.84	52	6.78	54	6.72	53	6.83	55	6.73	46	7.14	47	7.01	47	7.03	46	7.03
罗马尼亚	50	7.06	50	7.06	56	6.6	59	6.54	59	6.54	60	6.54	57	6.68	59	6.68	61	6.62	64	6.44	66	6.38
克罗地亚	51	7.04	51	7.04	53	6.81	53	6.73	50	6.93	50	6.93	50	6.93	52	6.93	54	6.75	58	6.63	60	6.57
塞尔维亚	55	6.62	63	6.49	65	6.33	64	6.33	66	6.33	57	6.67	56	6.71	58	6.71	64	6.57	66	6.41	63	6.41
黑山	58	6.57	65	6.43	68	6.27	74	6.15	76	6.05	79	5.94	77	5.94	79	6.01	85	5.72	83	5.69	81	5.74
北马其顿	68	6.33	72	6.21	73	6.16	73	6.16	73	6.16	74	6.16	72	6.25	78	6.02	95	5.23	88	5.57	78	5.87
阿尔巴尼亚	83	5.91	81	5.91	84	5.86	87	5.81	90	5.67	92	5.67	88	5.67	81	5.91	81	5.91	77	5.98	76	5.98
波黑	87	5.78	86	5.7	94	5.32	95	5.24	98	5.11	99	5.02	103	4.78	104	4.38	101	4.87	101	4.87	101	4.98
16 国平均	49	7.08	51	7.02	53	6.85	54	6.82	54	6.81	54	6.83	54	6.86	55	6.83	57	6.72	57	6.67	56	6.71

注:表由作者自制。数据来源于英国经济学人情报社民主指数 2006-2018 年各年度报告,http://www.eiu.com/,2019 年 9 月 25 日访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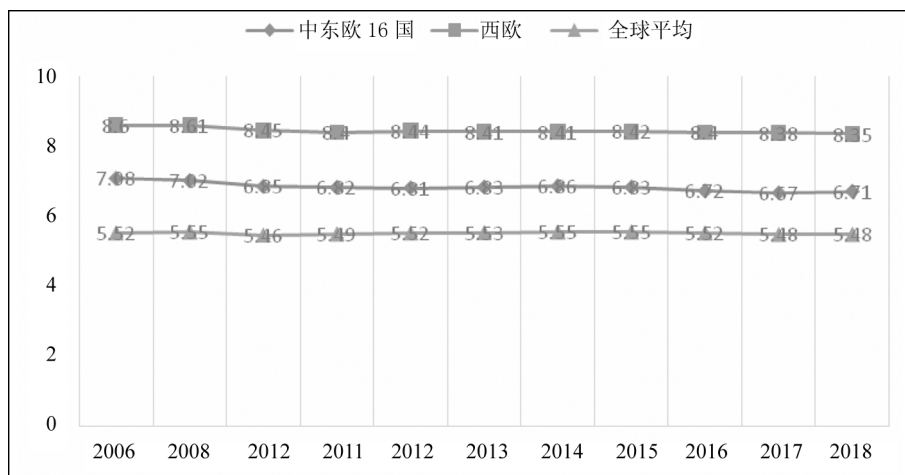
表 2 2018 年度欧洲与全球民主指数总体评分统计表

	全球	数量占 比(%)	人口占 比(%)	西欧	数量占 比(%)	中东欧 16 国	数量占 比(%)
完全民主	20	12.0	4.5	14	66.6	0	0
有瑕疵的民主	55	32.9	43.2	6	28.6	12	75.0
混合政体	39	23.4	16.7	1	4.8	4	25.0
威权/专制政体	53	31.7	35.6	0	0	0	0

注:表由作者自制。数据来源于英国经济学人情报社 2018 年度“民主指数”报告, [http://www.eiu.com/Handlers/WhitepaperHandler.ashx?fi=Democracy\\_Index\\_2018.pdf&mode=wp&campaignid=Democracy2018](http://www.eiu.com/Handlers/WhitepaperHandler.ashx?fi=Democracy_Index_2018.pdf&mode=wp&campaignid=Democracy2018), 2019 年 9 月 25 日访问。

由上可见,尽管没有国家被评为“完全民主”,但在国家民主类型及其占比方面,中东欧 16 国的总体状况仍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然而,在 2018 年度的民主指数报告中,除了北马其顿之外,中东欧 16 国的总体民主水平被指出现下滑。如图 1 所示,

图 1 中东欧民主指数评分对比变化示意图



注:表由作者自制。数据来源于英国经济学人情报社民主指数 2006-2018 年各年度报告。



通过对 2006 年至今 11 份民主指数报告相应的民主得分进行统计和对比后可以发现,与 2006 年和 2008 年相比,中东欧 16 国十几年来的平均民主得分的确呈现出一种“稳中趋降”的态势,只是下降速度相对而言十分缓慢。但是,结合西欧和全球的总体情况可知,中东欧 16 国民主得分的趋于下降实际上并未明显有别于全球平均水平,甚至近三年的总体变化趋势还要好于同期的西欧国家。

### (三)民主“倒退”抑或“调整”:基于“民主多样性”(V-DEM)指数的分析

从冷战后全球民主化的总体发展状况来看,有两个带有临界点意义的标志性事件:一个是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东欧剧变,另一个就是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于中东欧所在的欧洲地区而言,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更直接地体现于 2009 年爆发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此外,对欧洲各国民主的另一重巨大冲击来自 2010 年以来不断升级的欧洲难民危机。2010 年年底到 2011 年年初,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揭开了后来席卷西亚—北非大部分国家的又一波西式民主化浪潮——“阿拉伯之春”的序幕。随着不断涌向欧洲的难民潮的持续蔓延,难民危机与欧债危机的双重叠加使得欧盟成员国之间在债务问题和难民分配比例上的分歧与矛盾不断激化,民粹主义、疑欧主义由此愈加泛滥。而就在 2004—2007 年间,欧盟刚刚实现了史上规模最大的扩容,其主要对象恰恰就是以中东欧国家为主体的“新欧洲”。正是在上述复杂的背景下,欧洲地区迎来了一波以匈牙利、波兰等中东欧国家为主要对象的所谓“民主倒退”(democratic backsliding)浪潮。

如前所述,在民主测评方面,英国经济学人情报社民主指数虽出现较早并已具有较大的全球影响力,但无论从指标体系划分还是从具体的数据呈现等角度来看,经济学人情报社民主指数都有待进一步调整和优化。例如,在指标设计方面,该民主指数仍采取“政治权利+公民自由”二元维度下的五项指标体系。而在数据评分与呈现方面,民主指数也存在计算方法相对简单、区分度弱的问题,如测评结果仅采取加权平均,大多数评分极为接近且多年来变化不大等(见表 1)。针对这些问题,近年来国际上出现了不少“改进型”的民主指数。其中,瑞典哥德堡大学民主多样性研究所(V-Dem Institute)创设的“民主多样性”指数比较具有代表性。以下将结合该指数对中东欧近年来的所谓“民主倒退”现象展开相应的比较与分析。

“民主多样性”民主指数由瑞典哥德堡大学政治学系于 2017 年首创,每年发布一次针对过去一年全球民主状况的测评报告(V-Dem Annual Democracy Report),截至

2019年已累计发布3次。<sup>①</sup>2018年度“民主多样性”年度报告的封面显示,该指数是国际上唯一从历史视角的、多维的、严格分类且能做到多指标最细致呈现的民主测评指标体系。具体而言,在总的“自由民主指数”(V-DEM Liberal Democracy Index)之下,分为“选举民主指数”(Electoral Democracy Index)和“自由成分指数”(Liberal Component Index)。这两大分指数又由多达40项和29项指标(indicators)构成。在此基础上,V-Dem发展出一个涵盖世界上179个国家和地区的多达6种分指数:自由民主指数(Liberal Democracy Index,LDI)、选举民主指数(Electoral Democracy Index,EDI)、自由成分指数(Liberal Component Index,LCI)、平等成分指数(Egalitarian Component Index,ECI)、参与成分指数(Participatory Component Index,PCI)和协商成分指数(Deliberative Component Index,DCI)。在每一类分指数下,都包含独立的排名(rank)、评分(score)和标准差(SD+/-)。<sup>②</sup>

根据2018年度“民主多样性”年度报告,全球民主总体上延续了近年来的衰退趋势,不断走向“专制化”(autocratization)。但该报告也指出,全球民主水平并没有陷入“不可控的下滑”(free fall)状态。具体而言,共计有24个国家目前正陷入所谓“第三波专制潮”(third wave of autocratization),其中就包括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和塞尔维亚多达四个中东欧国家,占中东欧16国数量的四分之一。同时,在该报告公布的首份十大“民主风险国家”预测(2019-2020年)中,匈牙利(第4位)和波黑(第9位)也位列其中。此外,报告还详细列出了2008-2018年间有实质性和显著性的“民主倒退”的国家(见表3)。其中,捷克、匈牙利和波兰三国被列入“自由民主衰退国家”(Erosion of Liberal Democracies),保加利亚被列入“选举民主衰退国家”(Erosion of Electoral Democracies),塞尔维亚被列入所谓“民主崩溃国家”(Democratic Breakdown)。也就是说,该报告认为,在过去的十年中,中东欧16国中有多达5个国家出现实质性和显著性的民主倒退甚至“崩溃”。

<sup>①</sup> <https://www.v-dem.net/en/news-publications/democracy-reports/>, last accessed on 26 August 2019.

<sup>②</sup> [https://www.v-dem.net/media/filer\\_public/99/de/99dedd73-f8bc-484c-8b91-44ba601b6e6b/v-dem\\_democracy\\_report\\_2019.pdf](https://www.v-dem.net/media/filer_public/99/de/99dedd73-f8bc-484c-8b91-44ba601b6e6b/v-dem_democracy_report_2019.pdf), last accessed on 26 August 2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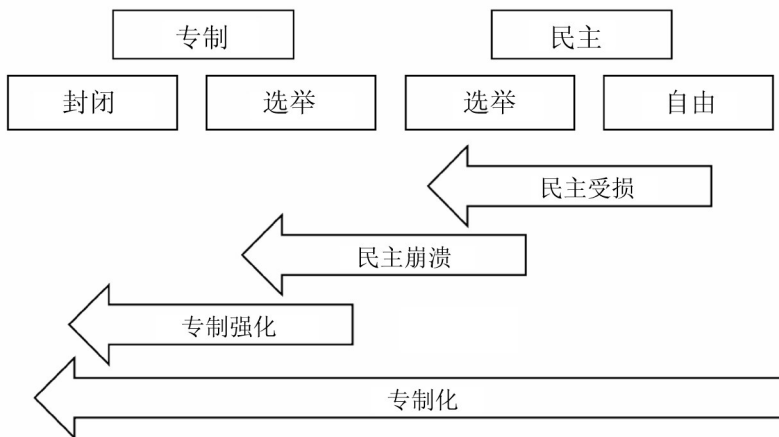


	V-Dem“自由民主”指数										其他 V-Dem 指数				非 V-Dem 指标	
	10	7	17	11	5	8	6	8	11	13	14	3				
巴林																
布隆迪																
海地																
毛里塔尼亚																
泰国																
也门																
民主状况变化国家小计,灰色为发生显著变化国家																

资料来源：“民主多样性”2019年年度报告，[https://www.v-dem.net/media/16666b/v-dem\\_democracy\\_report\\_2019.pdf](https://www.v-dem.net/media/16666b/v-dem_democracy_report_2019.pdf), 2019年9月28日访问。

正如“民主多样性”研究团队所指出的,他们推出的民主指数及其指标体系(V-Dem)致力于从一种全新的路径出发来定义与测量民主,即通过更加多维(multidimensional)、精准(nuanced)和非集计(disaggregated)的方式来分析和呈现民主概念的复杂性。同时,该团队还宣称:“民主多样性”指数是基于全球3000多名相关领域学者的共同研究,相关成果也已形成当前世界范围内领先的民主研究数据库。<sup>①</sup>应当看到,与英国经济学人情报社民主指数相比,民主多样性指数在民主概念的多维度考察、指标的选取与分类、数据的赋值与加总等方面都实现了显著的改进与完善。例如,在对民主概念谱系及演变方面,民主多样性指数不再将选举作为区分民主与非民主的唯一标志,并对从民主到专制的不同演变类型做了更为精细化的区分(见图2)。然而,从根本上讲,上述努力仍未摆脱西式自由民主范畴下“民主—专制”二分法的窠臼。这一思维定势也被直接投射到对一些中东欧国家民主状况的考察中。例如,在该指数2019年度报告中,包括匈牙利在内的多个中东欧国家均被列入所谓“第三波专制潮”(third wave of autocratization)之列,匈牙利甚至被直接列为所谓十大“民主风险国家”(top-10 most at-risk countries)。<sup>②</sup>结合近年来中东欧地区实际的民主发展状况来看,民主多样性指数的上述“发现”显然与相关国家的实际情况有一定的差距,甚至不乏耸人听闻的成分存在。

图2 民主的不同分类及其演变



资料来源：“民主多样性”2019年年度报告。

<sup>①</sup> <https://www.v-dem.net/en/news/democracy-facing-global-challenges-v-dem-annual-democracy-report-2019/>, last accessed on 8 October 2019.

<sup>②</sup> Ibid.



#### 四 由激进转型到“非自由民主”:匈牙利民主化历程案例分析

匈牙利是东欧剧变中紧随波兰而较早完成民主转型的中东欧国家,也是该地区在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影响力都位居前列的重要国家。从东欧剧变时期的激进转型,到西方世界所谓民主“模范生”,再到近年来的“欧尔班现象”“非自由民主”的出现,匈牙利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民主转型及后续发展在中东欧域内乃至整个欧洲地区都具有相当程度的代表性和影响力。

##### (一)从激进转型、民主巩固到“非自由民主”

与波兰在剧变前经历了长达十年的间歇性动荡期不同,匈牙利的社会动荡严格来讲始于剧变前的1988年下半年。进入1989年,同波兰国内日益动荡的政局相类似,匈牙利国内愈演愈烈的政治抗议浪潮已大大超出了执政当局所能控制的范围。执政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很快便因矛盾激化而分裂。1990年3月,匈牙利举行战后以来首次由多党参加的议会选举。在选举中,作为社会主义工人党后继党的社会党因得票少而失去执政权,沦为在野党,社工党则因得票更少而未能进入国会。与此同时,右翼自由派主导的匈牙利民主论坛在大选中获胜并上台执政。至此,短暂而激进的政治剧变基本结束。

与中东欧其他国家一样,匈牙利在剧变后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确立起了相对稳固的西式自由民主政体。然而,就政治体制的运行与质量而言,中东欧各国之间的差异性要相对复杂得多。尽管在总统与总理、议会与内阁间的权力分配方面,转型后匈牙利的议会民主体制及其运行仍存在一些问题。但作为中东欧地区的“和平之岛”,匈牙利在剧变后的十年时间内成为域内唯一能使每任政府维持届满、政权平稳交接的国家。<sup>①</sup>这一结果也显示出匈牙利的民主转型进程在中东欧地区具有相对较高的平稳性和实效性。与此同时,在对外关系方面,“欧洲化”也成为匈牙利执政当局(不论是左翼还是右翼)共同的外交大方向。1999年3月,匈牙利正式成为北约成员国。2004年5月,匈牙利在欧盟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东扩”中正式入盟,从法定身份上正式脱离“东欧”而成为欧洲的一员。

然而,就在外界普遍认为匈牙利的民主转型与巩固进程将继续不可逆地按照欧盟设定的目标向前发展之时,以维克托·欧尔班为首的中右翼政党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

<sup>①</sup> 杨芳:《匈牙利转轨十年情况》,载《国际资料信息》,1999年第10期,第8-12页。

(简称“青民盟”) 在 2010 年的上台执政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趋势。2010 年 4 月, 匈牙利举行国会选举第一轮投票。在野的青民盟及其盟友基督教民主人民党获得压倒性胜利, 在国会 386 个议席中获得 53.37% 的议席即 206 席。随后, 欧尔班领导下的匈牙利政府开始陆续出台一系列在西方社会认为颇具争议性的重大改革举措。在宪法方面, 2011 年 4 月, 匈牙利议会通过了名为《基本法》的新宪法。其中, 国会议员数目由 386 名减至 199 名, 并定于 2014 年再次举行大选。此外, 新宪法还将匈牙利国名由“匈牙利共和国”改为“匈牙利”; 将基督教作为匈牙利历史和文明的基础; 规定主要法律的修改需经议会 2/3 多数批准; 宪法法院只有当生命和人类尊严、个人数据和宗教自由等基本权利受到侵犯时才能否决政府制定的预算、税务和海关等法律, 等等。<sup>①</sup> 在媒体管控方面, 通过新《媒体法》等形式加强政府对媒体的监管力度。根据新《媒体法》的规定, 全国所有的广播、电视和网络媒体及其传播内容都不得违反政府有关规定, 否则将被视为侵害“公众利益”。在议会选举方面, 欧尔班政府还通过新的选举法, 配合对议会的相关改造, 继续维持青民盟相对于其他政党的竞选优势, 以此来确保本党能够长期执政。

2014 年 4 月, 在匈牙利新一轮的国会选举中, 由青民盟和基督教民主人民党组成的匈牙利现执政联盟取得决定性胜利, 共获得 2/3 的国会议席。在拥有 199 个议席的匈牙利新国会中, 现执政联盟获得 133 个议席(青民盟 117 席、基民党 16 席), 欧尔班政权得以再次执政并延续其既有政策。2018 年 4 月, 在最新一届国会选举中, 欧尔班领导的执政联盟再次以绝对多数的优势获胜, 继 2010 年和 2014 年两次赢得国会选举后, 欧尔班正式开启他的第三个任期。实际上, 早在正式选举之前, 外界已经普遍认为, 在后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时代, 随着匈牙利国内右倾化、民粹化的持续加剧, 以及欧盟一些国家在难民、反恐、经济政策等领域的离心倾向, 匈牙利势必再度将欧尔班及其领导下的青民盟视为维护本国及其公民利益的唯一代表。同时, 作为与其具有相同意识形态和政策取向的右翼政党, 在波兰执政的法律与公正党也持续受到“欧尔班主义”的“启发”。从自由民主到非自由民主, 从自由市场经济到国家干预, 从亲欧到疑欧, 欧尔班事实上成为匈牙利“再转型”的主导者, 同时也打破了 1990 年代中期以来中东欧国家转型不可逆转的共识。<sup>②</sup> 可以预见的是, 在未来的新一届任期内, 匈牙利政府还会继续奉行保守的“非自由民主”化的政策取向, 包括波兰在内的一些中东欧

<sup>①</sup> 《匈牙利国会通过新宪法》, <http://hu.mofcom.gov.cn/aar-ticle/jmxw/201104/20110407506011.html>, 2018 年 5 月 26 日访问。

<sup>②</sup> 孔田平:《欧尔班与匈牙利的再转型》, 澎湃网,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149573](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149573), 2018 年 5 月 26 日访问。

国家也会继续受到匈牙利的显著影响,而这些无疑都给欧盟及其背后所代表的传统西方自由民主道路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甚至挑战。可以说,欧尔班不仅根本改变了匈牙利的政治经济景观,而且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与反思中东欧国家多年来的转型、民主化和欧洲化等基本问题。

## (二) 匈牙利的“非自由民主”评估:基于民主指数 2006-2018 年年度报告的分析

针对欧尔班领导下的匈牙利政府的上述改革举措,西方主流社会纷纷以匈牙利“民主倒退”“重回威权主义”之名加以强烈批评。已经成为正式成员国的匈牙利的上述举动更被欧盟视为对《哥本哈根协议》关于民主、自由、多元化等基本价值观的破坏甚至颠覆。实际上,对那些处于“第三波”民主化中的国家而言,它们大多数是长期处于所谓“威权统治”之下,历史上缺乏西方代议制民主传统。对其而言,“滚雪球”效应下的民主扩散带来的民主转型很有可能并不具有深厚的内部基础,一旦外部环境不再有利于民主的维持以及成长壮大,那么随之而来的威权回归与民主“倒退”等将是有可能发生的现象。相比而言,匈牙利、波兰等中东欧国家在历史上就具有较长时期的多党议会制传统。再加上 21 世纪以来欧盟、北约等外部约束力量的制约与推动,以匈牙利为代表的中欧国家普遍被认为是西式民主化下的“优等生”,且已走上西式自由民主的不可逆的发展道路。正是在上述预期下,匈牙利的“非自由民主”化才更使传统西方国家感到意外甚至忧虑。以下以英国经济学人情报社民主指数历年报告为主,对进入 21 世纪以来尤其是 2010 年以来匈牙利的民主发展状况进行相应的分析。

根据“民主指数”对匈牙利历年民主状况的年度评估数据,自 2006 年起至 2018 年,匈牙利的总体测评状况如表 4 所示。

表 4 匈牙利民主指数相关评分明细表

	排名	总分	选举过程与多元化	政府运行	政治参与	政治文化	公民自由
2006 年	38	7.53	9.58	6.79	5.00	6.88	9.41
2008 年	40	7.44	9.58	6.07	5.56	6.88	9.12
2010 年	43	7.21	9.58	6.07	5.00	6.88	8.53
2011 年	49	7.04	9.58	6.07	4.44	6.88	8.24
2012 年	49	6.96	9.17	6.07	4.44	6.88	8.24
2013 年	49	6.96	9.17	6.07	4.44	6.88	8.24
2014 年	51	6.90	9.17	6.07	4.44	6.88	7.94

2015 年	54	6.84	9.17	6.07	4.44	6.88	7.65
2016 年	56	6.72	9.17	6.07	4.44	6.88	7.06
2017 年	56	6.64	8.75	6.07	4.44	6.88	7.06
2018 年	57	6.63	8.75	6.07	5.00	6.25	7.06

注:表由作者自制。数据来源于英国经济学人情报社“民主指数”2006—2018 年年度报告。

如表 4 所示,除 2007 年和 2009 年之外,自 2006 年起,英国经济学人情报社(EIU)已发布了 11 份“民主指数”年度报告。一方面,从民主化的总体发展状况与评价上看,2006 年至今,匈牙利在民主状况总体评分和排名上均保持了相对稳定,历年总得分大体稳定在 6.50—7.50 之间,相差不超过 1.00。在民主排名方面,匈牙利在共计 167 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也相对靠前,稳定在第 35—60 位之间。然而,从发展演变的态势上看,根据表 4 中的数据,匈牙利自 2006 年以来的民主评分和相应排名呈现出“一边倒”式的“稳中趋降”态势,即在评分和排名上几乎只降不升,民主状况始终处于持续衰退之中;其次,在民主的类型方面,匈牙利自 2006 年以来一直稳定在“有瑕疵的民主”之上。但是,从总的发展趋势上看,匈牙利的民主状况却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例如,在 2006 年度的首份民主指数报告中,匈牙利在共计 54 个“有瑕疵的民主”国家中排名第 10,居于民主状况相对“良好”的“第一梯队”之中,位于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第 38 位。而到了 2018 年,匈牙利在共计 55 个同类型国家中的排名则大幅下滑到第 38 位,处于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第 57 位;在涉及民主评估的五项子类别中,除了政治文化一项保持不变外,其余四项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尤其是在“选举过程与多元化”和“公民自由”两大领域,匈牙利近十余年来的民主指数评分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例如,2006 年,上述两项的评分分别达到了接近满分即“完全民主”状态(10 分)的 9.58 和 9.41,而到了 2018 年,上述两项评分则分别大幅下滑至 8.75 和 7.06。又如,在政府运行、政治参与和政治文化方面,即使在评分最高的 2006 年,其相应得分也仅分别为 6.79、5.00 和 6.88,处于“有瑕疵的民主”和“混合政体”状态。到了 2018 年,上述三项的得分均出现较为显著的下滑,尤其是政治参与得分已经处于“混合政体”的评分下限(4—5.9),十分接近最低评分的威权政体(0—4)。

从“民主指数”年度评估报告的总体状况来看,进入 21 世纪以来匈牙利的民主化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入盟初期民主化的初始阶段,表现为以欧盟《哥本哈根协议》为主要参照标准的民主状况的相对良好时期;二是后入盟时代的酝酿发展期,表现为在全球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以及难民危机等内外因素的作用下国内各派力

量围绕民主化发展的探索与争夺期;三是波动与新变局阶段,表现为欧尔班及其领导下的青民盟主政以来民主自由发展状况的波动与“倒退”“回潮”期。

首先,在2006年也就是民主指数开始正式发布的初始年份,已经成功入盟两年的匈牙利在民主的各项指标评测中尚居于相对良好的状态之中。结合表5内容可知,从民主得分上看,匈牙利2006年度的民主指数总得分为7.53,尽管与传统上的西欧(8.60)和北美(8.64)之间尚有距离,但却远高于全球总体平均值的5.52,也大大领先于东欧地区28国的平均值5.76。从排名上看,匈牙利2006年的民主指数状况排名全球第38位,在东欧区域内,匈牙利仅落后于“完全民主”的捷克、斯洛文尼亚以及同为“有瑕疵的民主”的爱沙尼亚,排名该地区的第四位。当然,如果将俄罗斯、独联体国家等东欧、中亚国家排除在外,仅以本研究所指的中东欧16国为对象,匈牙利的民主指数得分也在中东欧各国中高居前列。

表5 2006年全球各地区民主指数综合评估结果一览表

	平均值	国家数目	完全民主	瑕疵民主	混合政体	威权政体
北美	8.64	2	2	0	0	0
西欧	8.60	21	18	2	1	0
东欧	5.76	28	2	14	6	6
拉美和加勒比	6.37	24	2	17	4	1
亚太	5.44	28	3	12	4	9
中东和北非	3.53	20	0	2	2	16
撒哈拉以南非洲	4.24	44	1	7	13	23
全球总体	5.52	167	28	54	30	55

注:表由作者自制。数据来源于英国经济学人情报社“民主指数”2006年年度报告, <http://www.eiu.com/>, 2019年9月27日访问。

其次,在全球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以及难民危机等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加之国内围绕民主政治发展的分歧,匈牙利的民主状况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进入不确定性日益增长的动荡期。在金融和难民危机的双重影响下,各国的民主发展状况必然会出现较大的不确定性和波动,这其中也包括深受全球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影响的匈牙利。据此,2010年度的民主指数评估报告指出,治理、政治参与、媒体自由是最容易受到金融危机的重点领域,而其主要的波及对象正是以民主传统深厚而著称的欧洲。在金融危



机前后,社会骚乱的主要诱因便是针对政府的危机应对举措尤其是致力于预算平衡的改革,因为它将不可避免地损害普通民众尤其是广大弱势群体的利益。以匈牙利为例,在危机后针对民众的政治信心展开的调查显示,遭受全球金融危机重创的匈牙利在一系列政治信任调查中都表现出更为消极的结果。例如,在针对政党、政府和议会的信心方面,匈牙利在2007年和2009年两年里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低水平,这与其相对较高的民主指数评分与排名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对政党的信任度上,2007年和2009年的调查结果分别为8%和9%,针对政府(21%、14%)和议会(21%、15%)的调查结果也同样体现出民众对政治组织的强烈不信任感。而在民主的总体信任度上,匈牙利国内的相关数据也仅有24%和23%,大幅落后于西欧甚至中东欧同类国家。<sup>①</sup>而在中东欧各国日益蔓延的对民主的不满情绪中,匈牙利是最具代表性的国家之一。

再次,2010年是匈牙利民主发展进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年份。欧尔班及其领导的中右翼政党青民盟赢得议会选举并上台执政。当年的民主指数评估报告指出,作为欧盟新成员国中民主“回潮”的代表性国家,匈牙利在青民盟上台执政后正式开始系统地改造匈牙利各项政治体制,包括议会选举制度、宪法、媒体等。有媒体甚至指出,通过欧尔班政权的运作,上述国家重要部门已经全面被青民盟及其附属势力主导,议会甚至还投票通过了严格限制宪法法院在预算审议方面的裁决权的议案。<sup>②</sup>同时,青民盟主导的选举制度改革也起到限制反对派和小型政党的作用。2014年4月,青民盟及其盟友基督教民主人民党再次以绝对多数的优势赢得议会选举。尽管在对互联网用户征税和启动针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调查等方面,欧尔班政府的决策遭到了相当一部分民众的反对,但青民盟在国内仍是唯一最具执政实力的政党。与此同时,2014年对中东欧民主化而言也是一个特别的年份。根据本年度的民主指数评估报告的统计,2013年尚处于“完全民主”状态的捷克在2014年度降为“有瑕疵的民主”国家。至此,随着后金融危机时代各国民众对民主不满的积累,中东欧各国中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被列入“完全民主”的国家行列。

最后,自2014年以来,随着欧尔班及其青民盟在匈牙利强势执政局面的延续,匈牙利的“非自由民主化”程度不断加深,并随着2018年欧尔班第三个总理任期的开启而进入新的巩固和发展阶段。在2016年的民主指数评估报告中,以匈牙利、波兰为代

<sup>①</sup>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Democracy Index 2010: Democracy in Retreat*,” pp.19–20, [https://www.eiu.com/public/topical\\_report.aspx?campaignid=demo2010](https://www.eiu.com/public/topical_report.aspx?campaignid=demo2010), last accessed on 29 September 2019.

<sup>②</sup> Ibid.

表的中东欧各国作为整体上民主“衰退”的典型被加以特别强调。针对东欧地区新近的民主状况,该份报告指出,东欧近年来在民主指数测评中一直乏善可陈,在剧变之后,该地区的民主发展始终缺少相应的基于信任的政治文化的支撑。尤其是在2016年度的民主指数评估报告中,东欧地区是表现最差的地区之一。其中,共计19个国家(总数为28个)出现了民主衰退现象,其余有6个国家的民主状况止步不前,仅有3个国家的民主得到小幅度改善。从整体上看,中东欧当年的民主指数平均值已经连续三年下降,并达到了它的最低值5.43(2006年度为5.76)。<sup>①</sup> 尽管已经有多达11个国家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但依然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重返“完全民主”国家行列。在代表性国家方面,匈牙利是除波兰之外中东欧民主衰退最具代表性和辐射影响力的国家之一。如前所述,由于民众对民主的支持度不断下降,全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弥漫着一种对西式自由民主的失望之情。实际上,在涉及民主指数测评的五项子类别中,政治文化的守旧、停滞不前一直是中东欧民主发展的限制因素之一。以匈牙利为例,从2006年至今,民主指数评估报告关于政治文化的评分始终停留在6.88这一固定水平。从本地区成年人对政治的基本态度上看,绝大多数国家的成人都对从事政治缺乏兴趣甚至极端厌恶,这种状况亟待改善。然而,随着中东欧各国近年来民粹主义和“疑欧”思潮的蔓延和发酵,包括匈牙利在内的中东欧国家的政治文化均陷入不同程度的衰败,执政当局也未能收获本国民众对民主制度与政府政策的积极评价与进步。

### (三)小结

综上所述,进入21世纪以来,在面临内外环境的不利影响下,中东欧各国的民主状况普遍发生了一系列不同以往的新变化。尤其是对匈牙利而言,自2006年民主指数首次公布以来,匈牙利民主发展经历了长达10余年的几乎一边倒式的“稳中衰退”趋势。面对2010年以来欧尔班领导下的匈牙利日益走上“非自由民主”化道路,欧盟显然失去了在中东欧各国入盟之前的主导权,始终未能对匈牙利形成具有现实强制性的外部约束。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匈牙利则充分利用了国内外形势给自身带来的机遇,在确保青民盟自身长期执政的同时,还以其独特的民主发展模式在中东欧其他国家产生了“示范”效应。其中,与青民盟在意识形态、内外政策上具有较高相似性的波兰法律与公正党成为效法“欧尔班路线”的典型代表。同时,随着第三个总理任期的开始,青民盟的长期执政正在使欧尔班的理念、路线、政策走向进一步的固定化、长期化。而面对匈牙利对西式自由民主的种种“出格”言行,欧盟及法德等核心成员国

<sup>①</sup>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Democracy Index 2010: Revenge of the ‘Deplorables’,” [https://www.eiu.com/public/topical\\_report.aspx?campaignid=DemocracyIndex2016](https://www.eiu.com/public/topical_report.aspx?campaignid=DemocracyIndex2016), last accessed on 29 September 2019.

虽然及时予以关注,但却缺乏有效的方法来对其施以所谓的“引导”和“矫正”。从目前情况来看,欧尔班领导下的匈牙利无疑将会在其又一个任期内继续巩固与发展“非自由民主”路线。未来,随着匈牙利以及青民盟政权面临的内外环境的变化,该国也不能排除“再民主化”的可能。但至少从当下的内外因素分析上看,匈牙利的“非自由民主”化道路仍将在短期内继续主导匈牙利的民主化进程。

## 五 结论与反思

综上所述,在东欧剧变 30 年后的今天,如何看待这一历史事件及其后续发展?如何从民主化的视角来全面评估中东欧各国的政治转型?针对这些问题,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立场、角度与观点。本文认为,中东欧的政治转型并非一个简单的、单一向度的和已经彻底完结的政治社会现象,而是一个应从更加广义的政治发展视角加以全面考察与评估的持续性进程。东欧剧变之初,中东欧各国几乎毫无争议地将西式自由民主作为本国政治转型和民主化的“模板”。对于政治、经济、社会和历史文化传统与西欧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性的中东欧诸国而言,盲目的西式自由民主化是否会而且已经引发了政治转型进程中的“水土不服”?西式自由民主的道路在当今的中东欧是否能够准确解释和成功应对政治转型中的一系列问题?是否出现了针对西式自由民主的大范围的反弹?匈牙利、波兰等一些中东欧国家中出现的所谓“非自由的民主”是否具有相当程度的代表性以及长期存在与成长的可能性?要探寻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都需要我们跳出西式自由民主“一元论”“终结论”的思维窠臼,深入中东欧政治转型的历史的、具体的和发展的过程中重新审视与反思。结合以上对冷战后中东欧政治转型进程的回顾、评估与总结,本文至少可以得出四点结论与思考。

第一,从政体类型上看,冷战后的中东欧各国均已确立起西式自由民主范畴下的多党议会制民主,并从整体上迈入了西方意义和标准上的“民主”国家行列。关于如何判断西式自由民主在一国的确立是否已经稳固的问题,西方学者各有其评价标准。例如,普沃斯基从政治博弈论的角度出发,认为巩固的民主制必须满足这样一种情境,即民主已经成长为人们之间唯一的游戏规则且任何人都不愿意游离其外。<sup>①</sup>林茨则指出,巩固的民主必须同时满足“公民社会、政治社会、法治、国家机器、经济社会”这五大相互关联的场域(arena)或条件。相比而言,亨廷顿提出了一个更为简洁并易于

<sup>①</sup> [美]亚当·普沃斯基:《民主与市场——东欧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改革》,第 14 页。

观察的判断标准,即“至少完成两次权力的和平交接”。<sup>①</sup> 结合上文对中东欧各国民民主指数得分与排名的相关分析可知,从政体类型和具体测评结果上看,冷战结束后的中东欧各国均建立起了同西欧国家相同或类似的稳定的多党议会制民主。同时,尽管具体程度不一,但依据西方主流的民主测评指标体系,当前的中东欧地区至少从整体上已经实现了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化”。<sup>②</sup>

第二,从民主的发展水平与质量上看,整体上实现“民主化”后,步入“后政治转型”阶段的中东欧各国仍不得不面临一系列挑战与不确定性。与20世纪90年代民主的激进转型不同,一个成熟稳固的民主制度的确立和良好运行绝非一朝一夕就可以轻易实现。实际上,早在进入21世纪之初,一批先前对中东欧民主化普遍持乐观态度的学者就已经明确意识到,急于在民主方面将中东欧各国与它们的西欧盟友等量齐观显然是十分轻率的。<sup>③</sup> 近年来,在欧债危机、难民危机等多重事件的冲击之下,先期入盟的中东欧各国在民主价值观、难民政策、一体化与本国自身发展等多方面均表现出与德法等“老欧洲”国家之间的分歧与矛盾。为此,除了在民主、难民政策等具体问题上对匈牙利、波兰等入盟国家实施反制之外,德法等欧盟老成员国近年来也在不断探讨和酝酿基于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差异和不同利益诉求的“多速欧洲”(Multi-speed Europe)方案。然而,这一设想却因涉嫌将中东欧成员国“打入另册”而遭到大多数国家的明确反对。鉴于欧盟中东欧成员国几乎都是综合实力相对有限的中小型国家,加上入盟时间尚短,它们在《里斯本条约》框架下恐将难以摆脱长期被变相“边缘化”的命运。总之,对于已经入盟或积极争取入盟的中东欧各国而言,实现“民主化”也仅仅是完成了政治发展进程的阶段性目标。对此,作为西方民主转型学研究范式开创者之一的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近年来也不得不承认,即使是那些最“成功”的转型范例国家(以波兰、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为代表),其所带来的“自由、代议制和宪政的民主”也无法彻底解决转型后国家人们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以及满足他们的各种期待。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发展显然并未达到所谓“历史的终点”。<sup>④</sup> 未来,游走于一体化和疑欧分离倾向之间的中东欧各国的“后转型”之路仍会十分漫长且充满各种不确定性。

① [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第251页。

② 根据“民主指数”2018年度报告,在本文所涉及的中东欧16国中,仍有阿尔巴尼亚、北马其顿、黑山、波黑四国被认定为“混合政体”(Hybrid regime)而非完整意义上的“民主”国家。

③ Marc F. Plattner and Larry Jay Diamond, “Is East-Central Europe Backsliding?” pp.5-6.

④ Philippe C. Schmitter, “Twenty-Five Years, Fifteen Finding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1, No. 1, 2010, pp. 17-28; Daniel M. Brinks, Marcelo Leiras and Scott Mainwaring, eds., *Reflections on Uneven Democracies: The Legacy of Guillermo O’Donnell*,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71-86.

第三,从政治发展的视角来看,中东欧一些国家近年来出现的所谓“民主倒退”(democratic backsliding)并不是一种孤立和偶发现象,应在一种更为全面、宏观和综合的视角下加以审视和评价。相比于单一向度的民主化(democratization),政治发展(political development)更能全面体现一国政治制度化、政治文化、经济社会等总体发展状况。可以说,近年来波兰、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因所谓“民主倒退”而饱受西方尤其是个别欧盟老成员国的批评,实质上是一些西方大国站在西式民主“一元论”立场之上对中东欧个别国家的一种价值观讨伐和政治责难。实际上,即使从西式自由民主的视角和标准来看,匈牙利、波兰等中东欧国家相关的民主发展状况更多的也只是一种“适应性调整”,并未超出西方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的实质范畴。例如,对于匈牙利近年来不断兴起的所谓“非自由民主”,欧尔班近期就明确强调指出,“非自由民主”并不是要颠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和既有的西方民主体制。相反,他所要做的只是彻底改变现有社会不合理的组织方式(mode of organizing),简单归纳就是对民主说“是”,对自由主义说“否”。<sup>①</sup>对此,正如早先一位保加利亚政治学者所言:“他的力量来自他能够说出的事实:我从那里(自由主义)来,而且这是行不通的。”<sup>②</sup>可以说,作为一名曾经的西式自由民主“斗士”和“先锋”,欧尔班对激进的自由民主道路在匈牙利“行不通”的事实有着相比常人更加深刻的理解。也就是说,从全面的政治发展而非单一的西式自由民主的视角来看,匈牙利的“非自由主义”与其说是民主的“倒退”,毋宁说是一种对冷战后自由主义极端泛滥的激进发展道路的一种适当“回调”。

第四,在民主的评价及其标准方面,必须更加客观、全面地看待当前国际上流行的各种民主测量与评估指标体系,切忌人云亦云、迷信盲从。一方面,西方学界和一些非政府组织在民主测量与评估领域具有起步早、成果多、影响大等多种先发优势,其对民主测量、评估与排名的理论研究及其创设、发展出的各种指标体系,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和深化冷战后国际民主发展状况的认识与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随着战后西方社会科学的迅猛发展,国际民主化的研究及其评估在系统化、模型化方面突飞猛进,无疑给战后的西方民主测量及其指标体系披上了一层“科学”“中立”的外衣。然而,从民主的定义、数据来源与评分、测评机构的属性与立场等多方面来看,西方民主测量及其指标体系不仅无法确保所谓科学性,更难以实

<sup>①</sup> <https://www.kormany.hu/en/the-prime-minister/news/yes-to-democracy-no-to-liberalism>, last accessed on 26 August 2019.

<sup>②</sup> 《法媒:“非自由民主”在中欧国家扩展》,参考消息网, <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2016/0513/1158498.shtml>, 2019年10月26日访问。



现真正意义上的“中立”。冷战结束以来中东欧政治转型的现实告诉我们,标榜“科学”“中立”的西方民主测量及其指标体系并不能全面、真实、客观地反映冷战后中东欧政治转型的全貌,更难言对中东欧各国当前的政治发展状况予以真正科学、中立的解释与评价。

实际上,民主的测量与评估绝不仅仅是一项单纯的学术性活动,西方世界着力推动和发展民主测量与排行,实则带有极大的政治色彩并隐藏着更深层次的战略意图。“民主判定和测量是一项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极强的行为,反映了国际上思想政治领域的较量与斗争。一些西方非政府组织热衷于此,正是意在突出和强调西方世界在国际政治领域的标准制定权和话语权。”<sup>①</sup>凭借着对民主测量与评估话语权的垄断,西方一些学者、政客不遗余力地将西式自由民主包装成全人类的“普世价值”和全球性政治标准,并依托名目繁多且花样不断翻新的各种指标体系与排行榜来向外“推销”。一些西方大国之所以热衷于民主测量、评估与排名,本质上还是意欲借助其在民主领域的话语霸权来实现对外“输出”民主和拓展自身全球战略利益的终极目标。对此,我们既要从学术上对其进行全面、客观、理性的辨析与批判,更应从政治上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与必要的警惕。

(作者简介:赵卫涛,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责任编辑:宋晓敏)

---

<sup>①</sup> 张树华等:《民主化悖论:冷战后世界政治的困境与教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页。